

奈及利亞的比亞弗拉獨立戰爭 (1967-70 年)

嚴震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摘 要

2017 年是奈及利亞比亞弗拉獨立戰爭的 50 週年紀念，儘管少部分的伊波族仍未忘情當年悲壯的事實，不僅紀念活動，更有新的獨立建國組織出現，但基本上類似比亞弗拉分離主義實現的機會，已是愈來愈渺茫。本文回顧奈及利亞發生內戰的原因，包括殖民政策、社會分歧（族群、宗教、區域）、政治資源分配不均、及軍事政變，並討論國際社會的態度、戰後的和解，以及降低族群衝突的機制。本文認為奈及利亞靠著正副總統候選人的族群、宗教及區域的互補，以及當選人得票必須有區域的平衡等選舉的設計，是它能夠化解社會分歧及區域矛盾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比亞弗拉戰爭、族群衝突、社會分歧、分離主義

壹、前言

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近年來經濟力量已和南非不相上下，可以說是非洲的第一大國，然而這個在獨立之前就被看好的西非大國，一路走來卻是跌跌撞撞，並非順遂。奈及利亞的民主政治因軍事政變及強人專政而中斷，直到 1999 年後才逐漸步向正軌。2007 年奈及利亞出現第一次文人接替文人執政的情形，2015 年該國經歷了首次的政黨輪替。另一方面，奈及利亞的多元族群、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對立的社會，不僅長期出現族群與宗教的衝突，更發生過一次幾乎是種族滅絕的內戰，讓這個國家的和平穩定，始終受到嚴峻的挑戰。

追究奈及利亞政治及社會不穩定的原因，當然得歸諸於英國殖民時期所創造的人為國家 (artificial state) 有關。基本上，奈及利亞原先存在三大族群及一百多個較小的次族群，北邊是信奉伊斯蘭教的豪沙－富蘭尼族 (Hausa-Fulani)，西南的猶魯巴族 (Yoruba) 及東南的伊波族 (Igbo) 則大多數是基督徒。他們不僅在語言及宗教上有所區隔，生活方式及政治制度也都有很大的差異，讓這些族群的社會分歧 (social cleavage) 極其明顯。若再因受教育機會不同而產生社經地位的階級或是政治權力的差距，就會導致這些分歧的重疊 (overlapped)，成為強化的分歧 (reinforcing cleavage)，以至於族群的對立更加嚴峻。

從以上對分歧的討論就可得知，奈及利亞並非一個民族國家 (nation-state)，更嚴格地來說，奈及利亞根本不是一個民族 (nation)，它是殖民時期所創造出一個政治單位，在獨立後成為一個國家 (state)，但這個新興國家內的各個族群卻要在獨立建國後，成為一個新的民族或國族－奈及利亞人，並且要對這個有點距離的新認同效忠。換句話說，奈及利亞與歐洲國家獨立建國的情形剛好相反，後者如 15 世紀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或是 19 世紀的義大利及德國，是先有民族，然後才有國家，而奈及利亞則是先有國家，然後再透過國族建立 (nation-building) 以建立一個新興民族。如果過去各個族群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這樣一個要求他由原先狹隘的族群認同，轉移到國家層次的國族認同，難度可能不會太高。然而，若這些族

群原本就有極大的差異，甚至在歷史中曾經是敵對、或是完全沒有互信及友誼的族群，國族建立的過程就會比較艱辛。

英國殖民奈及利亞期間，對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北部地區採取了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政策，維持當地伊斯蘭宗教領袖的政經地位，管理地方事務，以換取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效忠。在南部地區，由於基督教勢力的進入及教會學校的設立，猶魯巴族及伊波族有較多學習英文及受教育的機會，讓他們在從事商業活動及與殖民官員互動方面享有優勢。英國也認識到這三大族群的地區性，因此在殖民時間就將奈及利亞區分為北（Northern）、東（Eastern）、及西（Western）三個區域，已反映其各自的特殊背景。

奈及利亞很早就出現民族主義意識，受到一次戰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感召，該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在 1923 年就成立奈及利亞國家民主黨（Niger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NDP），在 1930 年代中期又出現一個比較激進的奈及利亞青年運動（Nigerian Youth Movement），隨後這兩個組織在 1944 年合併成為奈及利亞及喀麥隆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the Cameroon, NCNC）。不過，由於 NCNC 的領導人阿齊基維（Nnamdi Azikiwi）是伊波族，讓這個原本有可能是統合奈及利亞的獨立運動被視為過度照顧東南區的政治利益，給予外界也促成西南地區及北部地區各自獨立組織的興起，分別是行動團體（Action Group, AG）和北方人民議會（Northern People's Congress, NPC）。基本上，奈及利亞在獨立之前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所謂的族群政黨（ethnic party），訴求基礎在於狹隘的地域性，缺乏全國性的支持。

貳、比亞弗拉戰爭發生的遠因

伊波族的部落和猶魯巴的階層社會有很大的不同，沒有部落的酋長，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伊波族是最懂得與殖民者打交道的族群，不僅有快速學習英文的能力（他們是西非地區英文說得最精準的非洲人），也很能夠自我調整，適應新的環境。屬於伊波族的著名奈

及利亞小說家阿切比 (Chinua Achebe)，就這樣描述他的族人：「和豪沙—富蘭尼不同，伊波人不受一個拘謹的宗教 (伊斯蘭) 所束縛，也和猶魯巴人不同，伊波人不受傳統階層的阻礙」(Unlike the Hausa/Fulani he was unhindered by a wary religion, and unlike the Yoruba he was unhampered by traditional hierarchies) (Achebe, 2012: 74)。

許多伊波人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離開了家鄉到奈及利亞另外兩個地區闖天下，無論是做生意或是投入律師及醫師的專業，表現往往超越在地的族群。阿切比宣稱他們在政治、教育、商業及藝術領域，都居於領先地位 (Achebe, 2012: 66)。在阿切比的筆下，奈及利亞是在他們領導下，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因為「這個伊波族讓殖民的英國相當頭痛，基本上是他們將英國人趕出奈及利亞，但現在 (獨立後) 卻成為公開攻擊的目標，以及任何殖民或獨立後奈及利亞失敗及不滿的代罪羔羊」(This group, the Igbo, that gave the colonizing British so many headaches and then literally drove them out of Nigeria was now an open target, scapegoats for the failings and grievances of colonial and post-independent Nigeria) (Achebe, 2012: 67)。確實，在奈及利亞獨立後，伊波族擔任政府文官及軍官的人數，遠遠高過人口的比例。這讓他們產生優越感，也引發其他族群的反感及怨恨。有觀察家指出，伊波族原先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最強的民族主義者 (nationalists)，但在獨立建國的初期，卻愈來愈走向部落主義 (tribalism) (Anber, 1967)。此外，在 1966 年時，東部地區約有六成二的孩童就讀小學，但北部僅有 8% (Ostheimer, 1973: 155)。這樣的教育程度差距，也會讓北方的穆斯林擔心伊波族會在政府中取得支配地位。

無論如何，英國在建立奈及利亞這個殖民地時，並沒有意識到把這些不同族群、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三個族群放在同一個國家內，會造成如此難以化解的矛盾。這也是為何長期觀察非洲政治的英國非洲專家海契 (John Hatch)，在他的專書《奈及利亞：災難的根源》(Nigeria: The Seeds of Disaster) 中，明確地指出早在 1914 年英國的奈及利亞總督魯加特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 將南北兩個殖民地合為一時，就以種下奈及利亞內戰的遠因 (Hatch, 1970: 240)。

參、比亞弗拉戰爭的近因

伊波族對獨立建國頗具信心的一項理由，是奈及利亞蘊藏最豐富的油田在東部地區，自 1957 年開採後，在 1967 年時油元收益已達奈及利亞歲收的 20%，預計幾年後這個比例還會加倍。因此，對伊波族來說，獨立的比亞弗拉比他們留在奈及利亞內，會更繁榮 (Meredith, 2005: 202)。

在比亞弗拉戰爭發生前一年，奈及利亞經歷了兩次的軍事政變，不僅推翻了文人政府、結束了第一共和，更製造及強化族群間的猜忌。事實上，奈及利亞在 1960 年獨立時，就選擇了聯邦制度，國家維持北、東、西三個區域。聯邦制度保障了個區域應享有的自治及權利，在聯邦政府方面，不同的族群也嘗試在權力分配方面達成平衡。聯邦的總理巴萊瓦 (Abubakar Tafawa Balewa) 是來自北方的穆斯林，聯邦的總統則是伊波族的基督徒阿齊基維，三個區域的總理分別是北區的貝婁 (Ahmadu Bello)、東區的歐克帕拉 (Michael Okpara)、及西區的阿金托拉 (Samuel Akintola)，當然他們的族群和宗教背景都與所代表的區域相同。

聯邦制度下各區域在國會分配的席次及相關資源，取決於人口的多寡。1962 年奈及利亞進行了獨立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census)，最終計算出的人口數分別為北部地區 3,100 萬人、南部地區 (東區加西區) 則是 1,300 萬人，雙方都指控對方的人口總數有灌水的嫌疑，因而拒絕接受普查的結果。一年半後，奈及利亞再度進行人口普查，結果總人口數來到 5,560 萬。在一年半內，北部的人口調整為近 3,000 萬，東部人口維持人口成長應有的微幅增加，西部則是從原先的 1,000 萬快速增加到 1,250 萬，一個在生育率研究方面不可能的數字。

北部及西部兩個區都能接受新的數據，但東部和新增的中西部 (Midwest) 則悍然拒絕。東區的總理歐克帕拉認為這根本是「天文比例的膨脹」(inflation of astronomical proportion) (Arnold, 2005: 195)。人口普查在其他任何國家或許僅是一項統計資料，但在奈及利亞卻是相當敏感，因為它涉及權力及資源的分配，而數據不可靠所引起的不信任，更讓族群間的猜忌加劇。

1966 年年初軍事政變的發生，最主要還是對文人政府的貪腐沒有效

率、充斥的裙帶政治 (nepotism) 及部落主義等的不滿，但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及政治秩序的瓦解，讓這些所作的回應。發動政變的是由恩希歐武 (Chukwuma Kaduna Nzeogwu) 所帶領的少壯派年輕軍官，聯邦總理巴萊瓦、北部地區總理貝婁、西部地區總理阿金托拉，及許多資深軍官，都在這場流血政變中喪生。在混亂中，聯邦政府乾脆將政權交給倖存的軍人艾倫西 (Johnson Aguyi-Ironsi) 少將。發動政變者隨即放下武器，但艾倫西並未將政權交還給文人政府，反而是暫時停止憲法運作，成立軍事政府，結束了第一共和。

雖然族群猜忌和矛盾可能並非這次政變的背後原因，但發動政變的軍官大部分屬於伊波族，而遇害的政治人物剛好又都是非伊波族 (伊波族的聯邦總統阿齊基維和東部地區的總理歐克帕拉都倖免於難)，再加上最後集大權於一身的艾倫西又是伊波族，而他上台後並沒有對同樣是伊波族的恩希歐武等發動政變、殺害許多政治人物的行為，做出任何的懲治，因此要說這次政治大地震中沒有族群的因素，大概很難讓人信服。

許多北方人從族群的角度來解讀這次的軍事政變，認為是伊波族針對他們在政府中逐漸增加的影響力所做出的回應。政變後五個月，艾倫西表示要推出新的憲法，將既有的區域廢除，成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新政府。北方人認為教育程度較高的南方人，顯然會在新政府中佔有優勢，而他們自己就成為政治的弱勢。很快地，住在北部地區的伊波族就成為暴力攻擊的對象，接著大多數是豪沙—富蘭尼的北方軍官發動新一波的軍事政變，推翻並殺害艾倫西，然後開始對伊波族的軍官執行槍決。由於這些報復行動有強烈的針對性，因此從伊波族的角度來看，豪沙的意圖就是要消滅他們，而基本上這就是種族滅絕 (genocide)，因此根本不可能再接受他們的統治 (Nwoli, 1972: 123)。

參與這次政變的北方軍官在穆罕默德 (Murtala Mohammed) 中校領導下，原先是想讓北部地區脫離聯邦，但最終因為新領導人的關係，決定還是維持奈及利亞領土的完整。新政府領導人的是年僅三十一歲、卻是北方最資深軍官的參謀總長高溫 (Yakubu Gowon) 上校，雖然他來自北方，但信奉基督教的少數族群提弗 (Tiv) 的背景，至少可以讓北方接受。高溫是

強烈的聯邦主義者，具有「一個奈及利亞」(One Nigeria) 的概念。高溫的軍階高過穆罕默德，讓他成為領導人，也保住了奈及利亞未走向分離主義。

由於高溫無法阻止北部地區伊波族持續遭到殺害，也未能有效保障東部地區少數北方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讓近三十萬的伊波族在驚恐中逃離北方，返回家鄉。東區軍事首長歐朱庫 (Chukwuemeka Odumegwu Ojukwu) 要求將伊波族的軍官撤回東部地區，但遭到高溫的悍然拒絕，因此奈及利亞的危機並沒有因此解除。

最終導致東部地區脫離聯邦、建立比亞弗拉共和國的導火線，就是高溫在 1967 年 5 月 27 日對全國的演說中，宣布將四個區域打散為十二個省。原先伊波族佔優勢的東區 (Eastern Region) 分成三個省，分別是東中省 (East-Central State)、河流省 (Rivers State)、及南東省 (South-Eastern State)，伊波族在新的河流省成為少數，同時還使它失去了最重要的石油資源 (Rothchild, 1970: 522)。

東部地區除了伊波族外，還有許多少數族群，如伊比畢歐 (Ibibio)、伊釗 (Ijaw)、艾菲克 (Efik) 等，他們當然同情伊波族在北部地區的遭遇。然而，他們並不見得希望比亞弗拉獨立，因為在分離後的新國家中，這些少數族群將在伊波族主導下成為弱勢 (Meredith, 2005: 203)。然而他們所在的剛好就是油源豐富的地區及主要的海港，這也是為何伊波族需要他們的支持，而無法接受高溫將四區再分為十二省的政策，因此在政策宣布後三天，長期對抗聯邦政府的東區軍事首長歐朱庫就宣布比亞弗拉的獨立建國，7 月聯邦政府入侵比亞弗拉 (Kirk-Greene, 1971)。

肆、近乎種族滅絕的內戰

聯邦政府領導人雖然有誠意化解伊波族的猜忌，但歐朱庫不斷在東部地區透過媒體渲染族人在北部地區的遭遇，同時還誇大死亡的人數，由剛開始的 7,000 人，到歐朱庫所宣稱的五萬人，讓伊波族因為擔心種族滅絕，而走向對抗的不歸路，這個情緒也推波助瀾，讓歐朱庫藉著這股氣勢，宣布比亞弗拉的獨立。

在比亞弗拉宣布獨立後，很清楚可以看到聯邦政府在軍力方面有絕對的優勢，而且在法理上是要維護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因此有其正當性。國際社會方面，大多數非洲國家是站在聯邦政府的一方，畢竟許多國家也是多元族群社會，一些也同樣面臨分離主義的挑戰，當然不會支持比亞弗拉的獨立建國，以免間接鼓勵國內分離主義的勢力採取同樣的行動。

當比亞弗拉宣布獨立時，它雖然代表「自決」，但違反非洲團結組織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所堅持「領土完整」 (territorial integrity) 的原則，或許這是為何只有四個非洲國家給予比亞弗拉的外交承認，其中兩個提供武器 (Stremlau, 1977: 136-39)。事實上，這些外交上的承認是在比亞弗拉宣布獨立後近一年才開始出現，坦尚尼亞在 1968 年 4 月率先作出外交承認，接著是 5 月份的加彭、象牙海岸、及尚比亞。坦尚尼亞的哲學家總統尼耶瑞 (Julius Nyerere) 提出他為何要承認比亞弗拉的原因：伊波族是英國殖民統治時非志願地被納入奈及利亞，如果族人決定脫離獨立，他們有權如此做 (Mwakikagile, 2010)，尚比亞的總統孔達 (Kenneth Kaunda) 也採取類似的立場。加彭及象牙海岸的外交動作，則符合法國的外交利益，因為巴黎可以透過這兩個法語國家提供武器給比亞弗拉。在法國的眼中，一個因為分離主義而弱化的奈及利亞，將無法在非洲成為強權，讓法語非洲國家不至於受到它的支配。基於此，法國成為比亞弗拉最主要的武器供應來源。象牙海岸總統胡佛埃－波尼 (Felix Houphouet- Boigny) 一直就不喜歡奈及利亞在西非地區的大國地位，因此樂見比亞弗拉戰爭出現，削弱它的影響力。

另兩個歐洲殖民國的葡萄牙，同樣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選擇支持比亞弗拉，因為它們不希望自己的殖民地追求獨立，奈及利亞的動亂可以讓非洲人對推翻殖民統治是否一定帶來安定與希望，持有保留態度。葡萄牙在 1960 年代中期時，還沒有做好去殖民化的準備，仍然希望持續維持它在非洲的五個殖民地 (維德角、幾內亞－比索、聖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及莫三比克)，西班牙則仍擁有赤道幾內亞和西撒哈拉兩個殖民地。葡萄牙透過西非的幾內亞－比索殖民地將武器運往比亞弗拉。非洲兩個白人少數統治的國家，南非及 1965 年剛獨立的羅德西亞，選擇支持比亞弗拉的理由與

葡萄牙類似，就是如果內戰的延續能夠讓漠南非洲第一大國的奈及利亞陷入長期混亂及崩解，它們的白人少數統治將仍具正當性。這兩個國家也都提供武器給比亞弗拉，甚至有傭兵參與內戰。

殖民母國的英國剛開始時並未積極表態，它長期來往的對象是聯邦政府，但石油利益卻是在比亞弗拉。歐朱庫要求英國人的石油權益金應當付給比亞弗拉政府，倫敦也只能吩咐石油公司照做，但沒想到聯邦政府卻封鎖了石油的運送。在此情況下，英國最終選擇支持聯邦政府，並提供小型武器。不過，它拒絕出售戰機，這給予蘇聯見縫插針的機會，成為奈及利亞戰機的主要提供者。

中國大陸正值文革期間，照理來說應是無暇他顧，但由於它和蘇聯決裂，因此選擇在奈及利亞內戰中保持中立。不過北京的武器卻是經過坦尚尼亞輾轉進入比亞弗拉。雖然這些武器並非直接由北京提供，但它默許坦尚尼亞將它們轉給比亞弗拉，因此被聯邦政府批判為暗助叛亂團體（Ogusanwo, 1974: 233-37）。

在非洲其他國家方面，由於非洲團結組織的立場是支持主權及領土的完整，因此不少國家如埃及、蘇丹、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肯亞、塞內加爾、尼日、喀麥隆、剛果民主共和國及剛果共和國等，都是公開表態支持奈及利亞的聯邦政府。獅子山和烏干達雖然沒有給予比亞弗拉外交承認，而是保持中立，但私下卻是同情其際遇。由於比亞弗拉的伊波族以基督徒為主，因此有學者認為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會比較願意支持伊斯蘭信徒較多的聯邦政府（Saideman, 2011: 100）。國際人道組織如 Caritas 及 Joint Church Aid 在比亞弗拉內戰中，提供叛軍各項醫療援助（Stremlau, 1977）。

雖然比亞弗拉和聯邦的軍力有很大的落差，特別是聯邦政府的海軍封鎖奈及利亞東南海岸，在 1968 年 5 月拿下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後，比亞弗拉獨立的機會已不復存在（Duyile, 2016）。不過，由於有以上所提及的這些外國勢力的介入、國際社會的同情、部分非洲國家的外交承認、及一些人道組織的援助，再加上伊波族認為若投降，將會遭到種族滅絕的命運，因此決定誓死抵抗，在最後一年半的時間造成上百萬人的死亡，大部分是因飢餓而死，成為陪葬祭品（嚴震生，2013：296）。最終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

歐朱庫在 1970 年 1 月 10 日將政權交給他的參謀總長，選擇流亡象牙海岸，五天後比亞弗拉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這場非洲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內戰。

伍、戰後的和解及降低族群衝突的機制

在內戰結束後的第二天，高溫將軍發表了廣播談話：「我鄭重重申對那些被誤導加入叛變者給予普遍性特赦的保證。我們保證只要你順服聯邦政府，每個人都會享有人身安全」(I solemnly repeat our guarantees of a general amnesty for those misled into rebellion. We guarantee the personal safety of everyone who submits to federal authority)。接下來，他強調在這個內戰中，「沒有勝利者，也沒有被消滅者」(no victor, no vanquished) (Harden, 1993: 286)。另外，高溫還做出了三個 R 的承諾，就是和解、重建、及復原 (reconcil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habilitation)。一些觀察家認為，若不是高溫的堅持，戰後的和解絕對會相當棘手。只要聯邦政府對比亞弗拉進行報復，這個地區會持續有武裝游擊隊與中央對抗，奈及利亞還是有可能再度分裂 (Harden, 1993: 284)。

高溫和他的將領樹立嚴格的紀律，不讓低階軍官對伊波族進行報復，不僅沒有對伊波族要求戰爭的賠償，同時也未頒發任何勳章給聯邦政府軍。許多伊波族重新回到政府及軍隊的原先職務，他們在北部及西部的財產也都獲得歸還。無怪乎獨立媒體人聖約瑞 (John de St. Jorre) 指出「在人類的戰爭史中，很少有如此無流血的終結，戰後又是如此的慈悲」(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there can rarely have been such a bloodless end and such a merciful aftermath) (de St. Jorre, 1972: 404)。

雖然伊波族未遭到報復，但政治上其影響力卻是日漸式微。奈及利亞持續重劃行政區、增加省份的數目 (嚴震生, 1996: 74-75)，讓伊波族在東南地區的優勢因為過於集中而降低。此外，為了化解族群矛盾，避免族群政黨的惡性競爭，讓總統具有全國的民意基礎，奈及利亞制定了一項重要的選舉規定，就是總統當選人要在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省份中，獲得至少 25% 的選票。第二共和 (1979-83) 是十九省中的十三個，第四共和

(1999-) 則是三十六省中的二十四個。此外，各組的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必須來自於不同的地區，且信奉不同的宗教信仰。

舉例來說，奧巴桑喬 (1999-2007) 是來自西南地區奧貢省 (Ogun)，屬於猶魯巴族的基督徒，他的副總統阿布巴卡 (Atiku Abubakar) 則是來自北部地區阿達瑪瓦 (Adamawa)，屬於富蘭尼族的穆斯林。他的繼承者雅阿杜亞 (Umara Musa Yar'Ardua) (2007-10)，是北部地區信奉伊斯蘭信仰的富蘭尼人，他的副總統喬納森 (Goodluck Jonathan) 則是來自南部地區貝耶薩 (Bayelsa) 省的伊釗族 (Ijaw)。雖然貝耶薩是由河流省所分出來的，而河流省又是當年東部地區所分出的一省，但伊釗族與伊波族是兩個語言不同的族群，他們是具有相同的基督教信仰之鄰居。現任總統布哈瑞 (Mohammed Buhari) 又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富蘭尼人，而他的副總統則是猶魯巴的歐辛巴喬 (Yemi Osinbajo)。基本上，伊波族在過去五十年期間，尚未有機會在中央執政。

回顧非洲各國內戰結束的方式，有透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最終進行民主選舉者，如 1990 年代的莫三比克及賴比瑞亞或是本世紀初的蘇丹，前者僅是叛軍挑戰中央政府，後者則是分離主義運動。另外一種結束內戰的方式，則是國家暫時成為分裂的狀態，如 1990 年代的索馬利亞及 2000 年代的象牙海岸，前者是軍閥割據的低衝突情形，後者則是靠著國際維和部隊將國家暫時一分為二。第三種則是叛軍加入政府的權宜方式，如上世紀末期的獅子山及本世紀初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最後一種形式則是一方的軍事勝利，如 1990 年查德及 2002 年安哥拉結束內戰的經驗。

我們先不討論這些內戰中是否有分離主義，而單從上述結束內戰的各種形式來看，顯然比亞弗拉屬於第四種形式，就是聯邦政府的軍事勝利，讓後續的發展沒有新的變局。事實上，安哥拉曾在 1992 年達成和平協議，舉行多黨民主選舉，然而在叛軍領導人在選舉落敗後，選擇重新拾起武器，進行對抗，讓內戰又延續十年，造成更多的傷亡，因此一方的軍事勝利，或許是長痛不如短痛得較佳選擇方式。

伊波族或許是天生注定具悲劇的命運，因為比亞弗拉的分離運動若是晚三、四十年出現，或許也能如厄立垂亞脫離衣索比亞、或是南蘇丹獲得

公民投票的機會成為全球最新的國家一樣，為包括非洲在內的國際社會所接受。比亞弗拉的獨立運動也未如同所預期的由明轉暗、維持一個武裝叛亂的組織，持續挑戰奈及利亞的聯邦政府。反倒是在非洲一些並沒有嚴重內戰衝突的國家，如塞內加爾南部的卡薩曼斯 (Casamance) 或是馬利北部的圖瓦雷克 (Tuareg) 的分離主義運動，始終都維持他們的能見度。

陸、結論

歐朱庫在流亡象牙海岸多年後，夏嘉瑞 (Shehu Shagari) 總統對其進行特赦，得以在 1982 年重返奈及利亞，並在 2003 年及 2007 年兩度參選總統，但分別僅獲得 3.5% 及不到 0.5% 的選票支持。換句話說，在他帶領比亞弗拉獨立戰爭的三十年後，竟然自己族人中都未給他應有的支持。不過，在他 2011 年過世後，倒是在次年的葬禮中獲得相當的殊榮。喬納森總統在紀念會上指出，歐朱庫對「族人、正義、公平、公正的大愛，促成他在奈及利亞內戰中扮演領導的角色。」(immense love for his people, justice, equity and fairness which forced him into the leading role he played in the Nigerian civil war) (BBC News 2, 2012)。

2000 年，一個主張比亞弗拉獨立建國的新組織－實現比亞弗拉主權國家運動 (Movement for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Sovereign State of Biafra, MASSOB) 在奈及利亞成立，不僅在東南區有其應有的群眾基礎，還獲得散居美國及英國的伊波族社群 (Igbo diaspora) 之支持。2002 年，另一個類似主張的團體－比亞弗拉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 of Biafra, IPOB) 近兩年都會在 5 月底舉行紀念活動，今年有五十名的 IBOP 遊行人士遭聯邦政府警方逮捕，因為「他們的行為有可能會破壞當地的和平秩序」(嚴震生，2017)。

儘管比亞弗拉的分離主義主張或許在奈及利亞東南地區還有部分的支持，也在散居世界各地的伊波族中擁有死忠者，但「獨立建國的主張和行動在今日最多僅是新聞的一則報導，其自決的理想已不可能實現」(嚴震生，2017)。雖然對主張比亞弗拉獨立建國者而言，這個看法顯得悲觀且非常殘酷，但或許也是在衡諸目前政治環境後，我們能夠做出最務實理性的分析。

附錄 1



圖 1 : 奈及利亞 , 1960-63



圖 2 : 奈及利亞 , 1960-63



來源 : Wikipedia (2018a) 。

圖 3 : 奈及利亞 , 1967-76



來源：Wikipedia (2018b)。

圖 4：1967 年的比亞弗拉

附錄 2：1999 年以來奈及利亞主要政黨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背景

年 Year	政黨 Party	總統候選人 Presidential Candidate	地域 族群 宗教 Home Ethnicity Religion	副總統候選人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地域 族群 宗教 Home Ethnicity Religion
1999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lusegun Obasanjo	Ogun Yoruba Christian	Atiku Abubakar	Adamawa Fulani Muslim
	All People's Party	Olaf Falae	Odon Yoruba Christian	Umaru Shinkafi	Sokoto Hausa Muslim
2003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lusegun Obasanjo	Ogun Yoruba Christian	Atiku Abubakar	Adamawa Fulani Muslim
	All Nigeria People's Party	Muhammadu Buhari	Katsina Fulani Muslim	Chuba Wilberforce Okadigbo	Oyi Igbo Christian
2007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Umaru Yar'Adua	Katsina Fulani Muslim	Goodluck Jonathan	Bayelsa Ijaw Christian
	All Nigeria People's Party	Muhammadu Buhari	Katsina Fulani Muslim	Edwin Ume-Ezeoke	Anambra Igbo Christian
2011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Goodluck Jonathan	Bayelsa Ijaw Christian	Mohammed Namadi Sambo	Kaduna Igbo/Hausa Muslim
	Congress for Progressive Change	Muhammadu Buhari	Katsina Fulani Muslim	Tunde Bakare	Ogun Yoruba Christian
2015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Goodluck Jonathan	Bayelsa Ijaw Christian	Mohammed Namadi Sambo	Kaduna Igbo/Hausa Muslim
	All Progressives Congress	Muhammadu Buhari	Katsina Fulani Muslim	Yemi Osinbajo	Ogun Christian

參考文獻

- 嚴震生，2013。《非洲政治：民主化、族群衝突及內戰》。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嚴震生，1996。〈第三波民主化的例外－奈及利亞〉《問題與研究》35 卷 4 期，頁 67-81。
- 嚴震生，2017。〈比亞弗拉獨立運動再起？〉《聯合報》5 月 29 日，13 版。
- Achebe, Chinua. 2012. *There Was a Country: A Personal History of Biafra*. New York: Penguin Pres.
- Adebayo, Akanmu Gafari. 1993. *Embattled Federalism: History of Revenue Allocation in Nigeria, 1946-1990*. New York: Peter Lang.
- Anber, Paul. 1967.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Nigeria and the Ibo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2, pp. 165-79.
- BBC News. 2012. "Ex-Biafra Leader Chukwuemeka Ojukwu Buried in Nigeria." March 2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17230673>) (2017/7/3)
- De St. Jorre, John. 1972. *The Nigerian Civil War*.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Diamond, Larry. 1995. "Nigeria: The Uncivic Society and the Descent into Praetorianism," in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 2nd ed. pp. 33-91.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Duyile, William Abiodun. 2016.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vy History*, Vol. 13, No. 2 (<http://www.ijnhonline.org/2016/11/17/nature-and-impact-of-involvement-of-the-navy-in-the-nigerian-civil-war-1967-1970/#intro>) (2017/7/3)
- Harden, Blaine. 1993. *Africa: Dispatches from a Fragile Continent*.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Hatch, John. 1970. *Nigeria: The Seeds of Disaster*. Chicago: NTC/Contemporary Publishing.
- Kirk-Greene, H. M. 1971. *Crisis and Conflict in Nigeria: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1966-1969*, 2 V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edith, Martin. 2005. *The State of Africa: A History of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London: Free Press.
- Mwakikagile, Godfrey. 2010. "Tanzania Recognizes Biafra," in *Nyerere and Africa: End of an Era*, 3rd ed. Washington, D.C.: New Africa Pres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ntercontinentalbookcentre/nyerere-and-africa-end-of-an-era/chapter-nine-tanzania-recognizes-biafra>) (2017/7/3)

- Nnoli, Okwudiba. 1995. *Ethnicity and Development in Nigeria*.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 Ostheimer, John M. 1973. *Nigeri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 Rothchild, Donald. 1970. "African Federations and the Diplomacy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4, No. 4, pp. 118-42.
- Saideman, Stephen M. 2011. *The Ties That Divide: Ethn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remlau, John J. 1977.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197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beru, Rotimi. 2001. *Feder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in Nigeria*.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Wikipedia. 2018a. "States of Niger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tes_of_Nigeria) (2018/2/21)
- Wikipedia. 2018b. "Biaf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afra>) (2018/2/21)

The Biafra War of Independence in Nigeria (1967-70)

Chen-shen Yen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2017 witnesse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aratist Biafra War in Nigeria.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few Ibos who cannot let go the sentiment of this tragic event by holding rallies of remembrance and organizing new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t is unlikely that separatism similar to the Biafra experience will repeat itself in Niger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uses of the Biafra War, including colonial policies, social cleavages (ethnic, religious and regional), imbalance of politic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military coups. It also deals with the various Europe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stand on the war, the postwar reconcili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created to reduce ethnic conflict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rough the designs that presidential and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erms of ethnicity, religion and region as well as a winning presidential candidate needs to garner widespread instead of concentrated support, a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social cleavages and regional contradictions can be alleviated.

Keywords: Biafra War, ethnic conflict, social cleavage, separatism